

第三章 大革命初期的旺代地區

一、共和與保王衝突的旺代戰爭

(一) 戰爭的經過

旺代戰爭爆發的原因，主要在於國民公會 1793 年 2 月 24 日所通過的徵兵法。提出徵兵三十萬「志願軍」的法案，目的是在面對歐洲各國對路易十六被處死以及法國不斷出兵侵略他國的軍事行動而組成的聯盟，這個聯盟包括英國 (Royaume-Uni)、普魯士 (Prusse)、西班牙 (Espagne)、俄國 (Russe) 及奧地利 (Autriche) 等。

這場國民公會與外國的戰爭，或者說是革命的戰爭，對於旺代地區的居民來說，不僅戰場遠在東部，而且長期效忠的王權居然被巴黎的執政者消滅了，以農民為主的旺代地區居民，自是強烈反對這個要求每一個市鎮都必須按人頭徵兵的法律，去幫助革命派分子打一場與自己無關的仗¹。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更不願意為了遠在巴黎的統治者，以國家被入侵的理由去犧牲自己的生命。

雖然這個徵兵法在全法各地幾乎都引起大小不一的反抗行動，但是到了 1793 年 6 月，只剩下西部有能力與巴黎相對抗。不過這時候的反抗行動，便不只是由下而上的抗爭，還有其它因素的加入。

當時共和政府的軍隊，因為身著藍色制服，被稱為藍軍 (les Bleus)；反抗

¹ 當地人民認為這是「為革命徵兵」(tirer pour la révolution)，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aris: Gallimard, 1986), p. 40.

政府的軍隊，以王室的代表色白色為象徵，配戴白色的識別標誌，被稱為白軍 (les Blancs)。白軍起先並沒有良好的組織，而是各自為政，有的是貴族趁機招募軍隊起兵，有的是自發反抗再推舉領導人，這些沒有嚴密組織的軍隊同樣將目標都放在政府機關、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執掌的教堂及少量駐守的藍軍軍營，一方面可以打擊共和政府在當地的統治體系，包括政府機構和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一方面搶奪軍隊的武器來加強自己的力量。這些軍隊，並沒有統一的服裝，基本上也只有農民軍的水準，即使有部分舊軍人與貴族的加入，實力仍然不強。

對白軍的組成分子而言，他們並沒有要進兵到巴黎的想法，他們只是單純地不想接受這個法案以及代表這個法案的巴黎統治者。穿著像個獵人，手拿著獵槍或者從軍隊手上搶來的武器，這些旺代人最早的目的，只想把旺代地區鞏固好，不會受到藍軍的攻擊以及共和政府的控制。能夠在起兵初期控制旺代的大部分地區，甚至略微向北方進兵，主要是當時駐守在西北部的藍軍還在布列塔尼征討另一支反抗軍，而其他軍力則在應付外國聯軍的進攻。

在軍事上，他們的指揮官賈克·加特里諾本身並不是貴族，他沒有作戰的經驗，卻能夠在許多貴族領導的部隊中被推為領袖，後來帶領四萬大軍作戰，主要靠的還是羅馬公教的力量。他本身是一個商人，透過平時的貿易網路，在旺代的各個地區都有良好的關係，加上他從小就在教堂學習如何擔任神職人員，因此十分虔誠，與羅馬公教關係甚佳，也有受過基本的教育。當政府徵集志願軍的行動來到他所居住的城市時，他便率眾反抗，拒絕為巴黎的共和政府賣命，並且將聖心標誌別在身上，成為以宗教為號召的軍隊²。透過宗教的力量，耶穌聖心標誌的加持，使得加特里諾的軍隊不斷增加，並且聯合其他反抗軍，成功擊敗藍軍於旺代的正規部隊，使藍軍暫時撤出旺代。而在政治層面上，3月底，一個高級委員會(*conseil supérieur*)成立，成為白軍在政治上的領導機構，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含大量的神職人員，這些神職人員的加入，給了白軍心理上的支持，認為上帝是站在白軍這一邊。不過這也使得政治與軍事的領導

²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New York: Wiley, 1967), p. 315.

人物中，貴族與神職人員佔去了大半，反客為主。

因此，隨著反抗範圍的擴大，以及單純由下而上反抗加入了其他的因素，這場戰爭的目的也開始改變。

6月，加特里諾正式接手整個白軍的指揮，白軍從此命名為王室與公教軍(L'armée royale et catholique)，標誌也統一成聖心標誌，其下並寫有「上帝與國王」(Dieu et Le Roi 或 Dieu Le Roi)，其宗旨為「支持我們神父的宗教，還給路易十七……光輝與穩固的王權」³，明顯地，從零散的反抗軍成為有政治目的的軍隊，而宗教也深深涉入其中。號稱有四萬大軍的部隊，向西部大城南特(Nantes)進發。當時藍軍主力仍在布列塔尼，南特並沒有多少軍隊駐防，也沒有料想到在旺代的反抗軍會出兵北進，因此白軍很輕鬆地拿下南特，並且在軍火與糧食上獲得相當的補給。但是，攻佔南特的白軍，一方面紀律不佳，一方面士兵們沒有想過要離鄉背井，最多就是在旺代地區征戰。因此形成一個奇特的現象：指揮官沒有能力約束手下的部隊，這些士兵打完仗後就回到自己的市鎮或村落裡，因為保護自己的家園比進兵四處征戰還重要。對他們來說，認同自己的村莊與認同旺代可以是相等的，但是出了旺代之後，那就與他們無關了。就像國民公會與外國的戰爭，不僅距離太過遙遠，心態上也不能認同。在從屬關係不明確，號令並不一定可以得到認可的情況下，指揮官並沒有辦法掌控所屬部隊的狀況。對加特里諾而言，反倒是由舊軍人和貴族組成的砲兵隊與騎兵隊，才是得以信賴的力量。⁴

這對白軍來說是一項嚴重的危機。這些人一開始是為了反抗巴黎的徵兵而聚集起來，宗教或者封建領主的力量充其量只是一種號召方式，並不是反抗政府最根本的原因。他們不是受過訓練的軍人，甚至大多數都沒有受過教育，導致部隊沒有紀律，而在自家附近與藍軍作戰，是種保護家園的行為，到外省去作戰，一如反對為共和政府去外地作戰一般，不是他們所願意的。但是對於掌

³ “soutenir la religion de nos pères et rendre à Louis XVII... l'éclat et la solidité de son trône,”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Seuil, 1987), pp. 107-108.

⁴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p. 63-64.

控政治與軍事實力的貴族與神職人員而言，要去巴黎推翻共和政府才是主要的目的，現在的作戰只是一種過程而已，旺代已經拿下了，就應該往昂熱(Anger)或其他通往巴黎的城市進發。在雙方想法不同的情況下，軍隊往往在離開旺代作戰成功之後，士兵們便毫無紀律地各自返家。這使白軍的軍事行動一直侷限於旺代及其周邊地區，無法做強力的推進。不過，在巴黎能夠做有準備的反應之前，3月到9月之間，白軍倒是連戰皆捷，攻陷旺代地區主要市鎮的大部分，並推進到南特與昂熱等外省城市。

對於巴黎方面而言，南特的陷落給了他們強大的震撼。原先，他們認為恐慌是最好的武器，以嚴刑峻法就可以遏止這批由下層人民為主組成軍隊的擴張，並使人民與政府合作。在3月18日，國民公會發佈命令，凡是與流亡貴族或拒宣誓派神職人員有來往者，皆送軍事法庭並在二十四小時內處死⁵。因為他們認為人民不可能自動自發起來反抗，背後一定有貴族或是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鼓動。後來又在4月27日發佈命令，威脅要在旺代及附近相關的省分，再多增加二萬個徵兵額度⁶。但是並沒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5月，巴黎還期待周邊的駐軍可以輕易地解決白軍的部隊，並且利用宣傳將白軍形容成無惡不作的敵人⁷。直到旺代的多數市鎮都已經被白軍奪取，國民公會才開始要求原先有辦理復員的省分重新徵集軍隊以應付旺代及其周邊的叛亂⁸。他們沒有想到，由農民為主組成的、裝備不全的叛亂，可以持續達數月之久，還能攻佔如南特的重要城市。貝特蘭·巴瑞(Bertrand Barère, 1755-1841)在8月1日的演說中，讓反革命運動與旺代劃上了等號，不管其他地區是否已經被弭平，「旺代

⁵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Vendée (以下簡稱 ADV) L22.

⁶ ADV L23.

⁷ 巴黎極端的《杜薛斯涅神父報》(*Le Père Duchesne*)在5月的第二三九號報導旺代白軍在旺代等地謀殺婦孺、焚燬市鎮，「但這支教宗的基督宗教軍隊很快就會像被追逐的野兔一般，無須再害怕他們。」見：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1), p. 190.

⁸ ADV L24.

依舊是旺代，是吞噬共和心臟的毒瘤。」⁹從此，旺代就成為共和政府統治下法國的「頭號公敵」(L'ennemi public numéro un)¹⁰。

不過藍軍並沒有給白軍多少進攻的空間，在 9 月時，藍軍就已經集結足夠的兵力面對白軍的擴張，並且展開包圍旺代的行動。在軍事作戰的同時，共和政府方面仍然繼續威脅旺代人，希望可以促使他們投降。在 9 月 16 日，旺代省政府由省長多米尼克·迪隆(Dominique Dillon, 生卒年不詳)發佈命令，凡是加入叛軍的，所有的財產、牲口、馬匹都會被沒入並拍賣¹¹，雖然當時他能控制的地方比白軍所佔領的地方還要少，所以這個命令在當時是宣示大於實質效果。藍軍這場對旺代的戰爭，動員了各省的兵力，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消滅反革命的旺代人。藍軍不僅較有作戰經驗，裝備、補給也都比白軍好上許多，同時，這些軍隊都是由外省人所組成，對旺代沒有任何感情，也不會手軟。相對的，白軍在守護家園時，必須考慮到市鎮內的住民，而住民數量遠大於軍隊的數量，反倒成爲一種額外的壓力。因此，在守城的戰役中，白軍往往死傷慘重而無法戰勝。除此之外，因爲白軍的組成分子對地形地貌較爲熟悉，在戰敗後時常化整爲零回到村落繼續進行游擊戰，也使得藍軍採取極爲暴力的手法，對收復的地區進行恐怖統治。至 12 月，旺代的白軍已經沒有多少力量可以反抗藍軍的攻勢。1794 年 2 月，旺代的叛亂大致弭平，此後仍有零星的反抗行動，但都不成氣候，只是隨之而來的恐怖統治，並沒有帶給旺代人太平的生活。

(二) 戰後初期的統治

戰爭結束後，共和政府必須爲這場戰爭的發生找尋理由，這個理由當然不會是推行徵兵法案招致民怨。在共和政府的宣傳裡，旺代的叛亂行爲導因於貴族和舊神職人員(拒宣誓派)的鼓動，《山岳報》(*Journal de la Montagne*)便曾在

⁹ “La Vendée est encore la Vendée, voilà le chancre qui dévore le coeur de la République.”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88.

¹⁰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49.

¹¹ ADV L380.

1793年6月說：「成千的法國人，被血腥的神職人員和驕傲的貴族所迷惑和誤導，攻擊其兄弟和友人，這些為他們贏得自由的人。」¹²除了因為高級委員會中的成員含有大量神職人員之外，貴族的確也在白軍中擔任重要的職位，包括有名的亨利·洛奇加克林(Henri de La Rochejaquelein, 1772-1794)，他曾擔任國王的安全參謀，並發誓要保衛路易十六。不過，恐怖統治的對象不僅僅只有神職人員和貴族，對人民製造恐慌，仍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從1793年12月開始，只要是與旺代戰爭沾得上邊的，大多難以倖免。包括最後一場大戰的薩弗內(Savenay)，除了被俘官兵(包含指揮官)遭到處決外，城內沒有參戰的老弱婦孺，大多也在審訊後遭到下獄，甚至處決的命運。

負責控制戰後旺代的軍事委員會(*commission militaire*)負責人約瑟夫-馬利·勒基尼奧(Joseph-Marie Lequinio, 1755-1813)曾記述每天都要把數以百計的人送進監獄，而這只是雙方戰爭暴行的一部份。他並曾說：「如果旺代反叛的人口只有三、四萬人，則無疑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把他們宰了。但是他們的人數太龐大了。」¹³恐怖行為是雙方戰爭暴行的一部份，這種說法當然是在為共和政府開脫，但是不可否認的，恐怖行為不只是藍軍的作法，白軍的確也在戰爭初期屠殺過支持共和政府的官員、平民與神職人員¹⁴。不過，從這裡可以看出，雙方都認為解決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徹底清除乾淨，省去日後可能的麻煩。除了每天不停的審訊與收押外，軍隊也實行焦土政策，並強迫遷村，遷村後如果還有居民或牲口，一律槍殺，使游擊隊沒有依附的空間，難以進行反抗活動。在宗教上，因為國民公會全面禁止公開的宗教活動，所以凡持有聖心標誌的人，都會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處決的命運。

在藍軍收復旺代期間，旺代的人口數大幅下降，據馬丁的統計，整個旺代

¹² 雷蒙·瓊納斯(Raymond Jonas)著，賈士蘅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France and the Cult of the Sacred Heart: An Epic Tale for Modern Times*) (台北：麥田出版，2003)，頁162。

¹³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168、174。

¹⁴ 白軍曾在馬奇古(Machecoul)屠殺投降的政府官員、軍隊、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以及支持藍軍的居民。

失蹤人數就超過一萬人，審訊時被處決的也超過四千人¹⁵。而可以找到完整資料做出統計的二十六個市鎮(約佔旺代市鎮數的十分之一弱)人口數，下滑了將近一半¹⁶，這其中除了戰死、被處決的因素外，也包含強迫遷居導致人口銳減的。不過整個旺代及其周邊三省，因為這場戰爭的關係，死亡人數大約佔了原有人口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¹⁷。

雖然戰爭與報復表面上在 1794 年中就已經結束，但是實際上雙方的爭鬥還是一直持續在進行。共和曆 3 年霜月(1794 年 12 月)，國民公會頒佈第四七九號法令，只要屬於旺代或朱安(Chouans，以布列塔尼地區為主的反抗軍)叛軍的人，在當月將武器交到市鎮政府，就可以不被逮捕審訊，也不會因為叛亂遭受處罰¹⁸。法令後面還附了一篇給西部地區、布勒斯特(Brest，布列塔尼首府)、瑟堡(Cherbourg，布列塔尼第一大港)地區人民的感人聲明，要他們放下武器，回歸共和政府的懷抱。其聲明大意是說，在兩年由英國人和其他外國人所指使的的恐怖戰爭裡，旺代與布列塔尼從幸福與富饒的土地變成了廢墟，法國人應當團結起來，以國民公會之名，對抗歐洲各國的侵略，不要再把槍口對內，繼續流血了¹⁹。

一面進行恐怖統治，一面卻又採取懷柔的作法，卻也顯示出，藍軍雖然收復了旺代，但是並沒有辦法全面綏靖，所以採用赦免的方式，希望白軍的殘餘分子可以自動出來投降。這種方式有沒有效果，檔案中並沒有記載，只是在損失近三分之一人口之後，旺代地區也難以再有大規模的反抗行動。下一次震驚巴黎的叛亂，要等到 1799 年才發生。

¹⁵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p. 102-103.

¹⁶ 由四萬零五百六十五人銳減為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七人，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151.

¹⁷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151.

¹⁸ ADV L380.

¹⁹ ADV L380.

(三) 共和與保王的衝突

要說這是一場共和與保王之間的戰爭，或許恰好因為路易十六被處死，而導致外國入侵，又隨著徵兵法案的頒佈，引起旺代地區激烈的反抗。但是要說反抗的最終目的是要推翻共和、恢復王室，多少有點牽強。畢竟從戰爭的過程來看，旺代本身居民的反抗，目的是為了抵制他們所不願意的徵兵法案。對旺代人而言，用雨果的話說，是一場「地方精神對抗中央精神」(la guerre de l'esprit local contre l'esprit central)²⁰的戰爭。但對保王派而言，這的確是一場共和與保王之間的戰爭。

既然如此，為何旺代戰爭後來會被宣傳為共和與保王衝突的戰爭？馬丁認為，除了對抗歐洲聯軍的需要之外，徵兵三十萬人還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測試國民公會在全法國的實力，是不是能夠一呼百應，也藉此機會把暗藏在各地的保王分子引出，一舉消滅²¹。所以徵兵法令一下達各省，果然立刻引起全國各地大小不一的反彈，但是除了西部地區以外，都沒有能夠造成太大的動亂。從拒絕徵兵演變成爲反革命，除了貴族和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加入是一個重要原因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共和政府的態度。在巴黎的共和政府，只認爲自己的目的已經達成，所有不願意配合徵兵的反對意見，都是共和及革命的敵人。當1793年3月14日，白軍拿下肖雷(旺代省較大的市鎮之一)，並於數日後擊敗藍軍在旺代最大的一支駐軍(約三千人)後，共和政府就直接把旺代的叛亂定義爲反革命²²。瓊納斯更進一步地認爲，會把旺代的叛亂定義爲反革命，主要是因爲共和政府不願意承認這是一個人民自發性的叛亂運動，因爲革命、共和與國民公會的合法性論點，其中一部份是來自所謂代表人民，以對抗代表貴族與

²⁰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I. <http://www.gutenberg.org/etext/9645>, 擷取日期：2008年6月30日。

²¹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p. 25-27.

²²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37.

神職人員的舊制度²³。當人民開始反對時，爲了確保自己統治的理論基礎，就必須將叛亂的理由歸諸於保王派的陰謀。從此，旺代就與反革命劃上等號。

如果回到旺代本身的情況來看，參與叛亂以農民爲士兵主力的白軍，這些農民以當時的情形，是不可能受過教育的。即便是指揮官加特里諾，也是因爲原本要當神職人員才進入教堂學習，不然可能也是文盲。這些人對於革命與反革命，甚至是啓蒙運動以來的政治觀念，是不可能有機會去接觸，甚至瞭解其究竟的。要把這些人歸類爲反革命，是政治上的做法。但是也不可否認的，除了對抗徵兵法案之外，一定也還有其他的原因，才能激起這麼大的叛亂。瓊納斯將此歸因於舊制度²⁴。法國大革命發生到旺代戰爭開始，時間不到四年，對於像旺代這種偏遠地區來說，感受並不是那麼強烈，尤其是對於中下階層的人，像是農民，生活跟以往並沒有不同。他們還是很習慣舊制度時，聽從貴族與神職人員生活的日子，貴族是原先的領主，而教堂與鐘聲本就是生活上依循的對象。因此，當旺代發生叛亂時，貴族與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加入後，他們也使用過去習慣的方法，鼓動農民加入他們的陣營。洛奇加克林的妻子在回憶錄中即有提到，教士利用教堂講道的時候鼓動農民加入貴族的陣營，並由貴族領導到前線去作戰²⁵。

除了旺代本身的因素，以及巴黎方面的看法，當時其他歐洲各國如何面對這場旺代戰爭，從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的報導中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793年3月25日，泰晤士報刊出法國3月19日的消息，即旺代發生動亂，文中並未有任何關於保王派的字眼，只有提到旺代省政府報告說這是一場「反革命」的叛亂，而帶頭者是流亡國外的貴族²⁶。4月27日，〈布列塔尼與普瓦圖的反抗〉(“*Insurrections In Brittany and Poitou*”)，才提到旺代已經被保王派所

²³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162。

²⁴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165-166。

²⁵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166。

²⁶ “France,” *The Times* (London), Mar 25, 1793, p. 3.

控制了，這也是論及保王派的第一篇報導²⁷。不過，當時英國的態度為何？在 6 月 25 日的社論中(四天後白軍攻佔南特，當時活動範圍大抵仍在旺代一帶)，英國的態度是偏向中立的，社論提到這場戰爭是奧爾良派(Orléanists)與共和派的戰爭，而不是共和派內部再一次的權力鬥爭。雖然共和派宣傳這次反抗行動是波旁王室在海外鼓動的，但這並非事實。令人驚訝的是，其他強權並沒有實際介入這場內戰。如果真的是保王派引起這場內戰，那英國就可以參加援助，不過說比做來得容易²⁸。所以，在內戰初期，歐洲各國應該都是採取觀望的態度，對於這場戰爭的本質還不清楚，是保王派的戰爭還是單純人民反抗，或者其他因素的反革命，都使得其他國家不願輕易介入。直到 1794 年 6 月 26 日，泰晤士報刊出一篇報導，才看到英國準備援助白軍，其標題是〈旺代的保王派〉(“The Royalists of La Vendée”)，內容提及英國不相信旺代白軍的龐大數量以及他們的戰果，不過保王派的確是在旺代奮鬥，只是因為武裝與共和派軍隊相差懸殊，而且有武器的人通常不到全軍一半的人數，國民公會則正派遣更多軍隊前往鎮壓，所以他們可能會不支投降。《泰晤士報》很高興英國政府已經打算伸出援手，供應武器給保王派，在法國國內維持這個戰場²⁹。但是當時白軍已經沒有能力與藍軍作戰，報導中的資訊錯誤百出，對情勢完全誤判，以為白軍還有能力與藍軍一搏，英國人即使要加入戰局，在這個時間點，也是徒勞無功的。這些報導也顯示出外國的干涉與介入，並沒有真正的出現³⁰，最多只是幫助流亡在外的貴族回到法國而已。實際上，這完全是一場法國的內戰。

誠如瓊納斯所認為的，雖然貴族在旺代戰爭中普遍出現在戰場上或成為領導者，但是貴族並沒有領導最初的叛亂³¹。旺代最初叛亂的動機，應當注意的

²⁷ “Insurrections In Brittany and Poitou,” *The Times*, Apr 27, 1793, p. 2.

²⁸ *The Times*, Jun 25, 1793, p. 2.

²⁹ “The Royalists of La Vendée,” *The Times*, Jun 26, 1794, p. 3.

³⁰ 至於國民公會在 1794 年 12 月發表聲明將叛亂的原因推給英國人與外國人的說法，泰晤士報雖然有節錄翻譯刊登，但是並沒有做出評論。見：“Proclamation to the Insurgents of La Vendée,” *The Times*, Jan 02, 1795, p. 3.

³¹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63。

一點是地方意識與中央集權的對抗。雨果在他描述旺代戰爭的著名小說《(17)93年》(*Quatre-vingt-Treize*)第三部第一卷第六章，以〈土地與人靈魂相通〉(“L'Ame de la terre passe dans l'homme”)為標題，特別提及旺代叛亂的特殊之處。旺代人在起兵的時候，是因為認同這塊土地、屬於這塊土地而起來反抗的，他寫道：「真正的旺代，是在這塊土地上的旺代，……旺代人在那裡是走私者、莊稼漢、士兵、牧者、盜獵者、自由射手、牧羊人、敲鐘人、農夫、密探、殺人犯、聖器管理人、森林裡的野獸」³²，他們的起兵，「是爲了偏見而戰，……是爲了孤立而戰，……是想要分離，……是要保護教區。」³³這些描述清楚地表明，旺代地區與巴黎的距離本來就很遙遠，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旺代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目的，是要保護真正的旺代，不受到外力侵襲。一群政治人物在巴黎的相互鬥爭，對旺代人來說，是不切實際而且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他們的土地、生活與宗教信仰。雨果在這一章的最後，一語道破旺代戰爭背後的意義：「故鄉、祖國，這兩個詞總結了整個旺代戰爭，這是地方意識(l'idée locale)對抗整體意識(l'idée universelle)的鬥爭，農民在對抗愛國者。」³⁴整體意識是由在巴黎的所謂愛國者，加諸給全法國人的，一種中央集權式的，由上而下，要求政通令達，一切以巴黎爲依歸。然而在旺代，這群農民，他們只懂得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故鄉。他們不知道法蘭德斯(Flandre)，不知道普魯士，爲巴黎的執政者，去從沒聽過的地方對抗那些從沒聽過的敵人，

³² “La vraie Vendée, c'est la Vendée chez elle...Le vendéen chez lui est contrebandier, laboureur, soldat, patre, braconnier, franc-tireur, chevrier, sonneur de cloches, paysan, espion, assassin, sacristain, bête des bois.”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

³³ “l'autre pour des préjugés... l'autre pour la solitude... l'autre veut l'isolement... l'autre la paroisse.”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

³⁴ “Pays, Patrie, ces deux mots résument toute la guerre de Vendée; querelle de l'idée locale contre l'idée universelle. Paysans contre patriotes.”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

這不是他們所願意的。他們只知道自己屬於肖雷、屬於馬奇古，當然也屬於旺代。雖然不若雨果誇張的述說有五十萬旺代男女老幼起來反抗，但也可以說是一場總體戰(*la guerre totale*)了³⁵。

不過雨果也認為，這些叛亂行爲，原先都只是以「地方精神對抗中央精神」。但是這種地方意識被操弄的結果，就是「可怕的愚昧」，造成「旺代反抗是一場可悲的誤會」³⁶。這就是有人在背後操控，使得旺代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人設想農民風暴可以襲擊巴黎，一個鄉村的聯盟可以包圍(巴黎的)萬神殿，像狗吠一般的聖歌與祈禱能夠壓過《馬賽曲》，一群穿著木鞋的農民可以衝垮菁英軍團嗎？」³⁷旺代人似乎只是被利用的棋子，從地方精神對抗中央精神，變成了保王派去對抗共和派的主力。換來的結果，不是地方精神的勝利，而是中央權力的擴張，旺代經歷了「八年的驚恐……荒蕪的田地、收成被毀壞、村落被焚燬、變成廢墟的城市、房屋被掠奪、婦女和孩童被屠殺、火炬燒毀茅屋、利劍刺進心臟、文明成了恐懼」³⁸。這種結局不是旺代人要的，他們的反抗只是想要維護自己而已。雨果本身的立場是支持共和，反對王權與羅馬公教的，從他的小說中也可以看到這種立場的投射，但是在描述旺代叛亂原因的篇章，他又帶有同情的意味，描述旺代人是勇敢的捍衛自己的土地與家鄉，只是

³⁵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87.

³⁶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 est un lugubre malentendu.”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I.

³⁷ “Se figure-t-on une tempête paysanne attaquant Paris, une coalition de villages assiegeant le Panthéon, une meute de noëls et d’oremus aboyant autour de «la Marseillaise», la cohue des sabots se ruant sur la légion des esprits?”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

³⁸ “l’épouvante de huit années... la devastation des champs, l’écrasement des moissons, l’incendie des villages, la ruine des villes, le pillage des maisons, le massacre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la torche dans les chaumes, l’épée dans les coeurs, l’effroi de la civilisation.”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II.

後來被保王派所操弄與欺騙，讓整場旺代戰爭變成共和與保王的衝突點。

共和政府的態度、旺代人的反應、貴族與拒宣誓派教士的想法、外國的動向，都讓這場內戰變得複雜許多。旺代人守護自己的地方意識，拒絕遠在巴黎的中央徵兵作戰；共和政府不願面對人民反抗自己的事實，將這些叛亂的行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貴族與拒宣誓派教士見獵心喜，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來推翻巴黎的共和政府，恢復王權的光輝；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隔山觀虎鬥，希望內戰繼續困擾法國，卻又不甚願意幫助保王派。原先以地方意識對抗中央集權，卻變成了保王對抗共和，戰後的強力鎮壓與恐怖統治，想必也是旺代人所始料未及的。

二、羅馬公教的影響力

旺代戰爭過去被視為是「人民革命」(la peuple-révolution)與「貴族、神職人員反革命」(la nobles-clergé-contre-révolition)對抗的誤解，就是因為羅馬公教所發揮的影響力³⁹。在內戰期間，對農民軍號召力量最大的，非羅馬公教莫屬。無論是貴族或者加特里諾，都利用羅馬公教在旺代的影響力，來組織軍隊，對抗共和政府。所以旺代人才會在當時被宣傳為「落後的農民」(les paysans arriérés)、「自信獲得神啓的」(les fanatiques)、迷信的⁴⁰。而羅馬公教的影響力又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信仰上，人們對於上帝與羅馬公教的信心；一個是生活上，在舊制度之下，神職人員與教堂所扮演的角色。

(一)信仰上的影響力

羅馬公教在旺代本就是絕大多數人的信仰，但是純粹信奉上帝，並不能驅

³⁹ Gérard Cholvy, "Les peuples de France entr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1760-1830)," dans Jean-Clément Martin dirig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Paris: Anthropos, 1993), p. 11.

⁴⁰ Gérard Cholvy, "Les peuples de France entr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1760-1830)," p. 11.

使他們上戰場。所需要的另一個因素，是要相信上帝會站在自己這一邊，也就是利用異象或神諭來引導大眾加入反抗軍。對於現代學者來說，這些所謂的異象或是神諭，大多為當權者所偽造，但是對於沒有受過教育又深信羅馬公教的人們，那就是上帝在為他們的行為背書，符合神的旨意。

把聖心標誌別在衣服上，便是這種「迷信的」做法之一。因為聖心除了是對抗革命的象徵之外⁴¹，人們當時也流傳著許多關於聖心可以帶來平安的傳聞與異象。在加特里諾起兵時，他便選擇用聖心作為自己部隊的號召，並且戴上念珠，象徵自己與手下的部隊屬於相同的信仰，而且這個信仰會保護他們⁴²。

讓旺代人自己認為他們受到上帝的照顧，使他們相信是上帝在引導他們，要他們當羅馬公教與王權的救星，就必須透過欺騙的方式⁴³。一個曾經參與旺代戰爭的藍軍將領，第一帝國時期被封為男爵的路易-馬利·屈侯(Baron Louis-Marie Turreau, 1756-1816)出版了自己在旺代戰爭的回憶，裡面便提到白軍製造或故意流傳了許多假的異象與神蹟，利用這種迷信鼓舞大家的士氣與熱情。聖壇上出現了聖母瑪麗、耶穌降臨等都是常用的說法。還有人們看見天使降臨，應許旺代這些聖壇與王權的守護者獲得勝利⁴⁴。雖然屈侯將軍本人的立場是不可能相信這些神蹟的傳聞，不過旺代白軍的士兵卻堅信這些應許必定實現。他形容這些人「都中了自信獲得神啓的毒，離開他們的教堂只為了衝向敵軍，以愚勇面對極大的危險，確信他們會征服敵人，不然也會以殉教的方式而死。」⁴⁵雨果也寫道，在有人殉教而死之後，他們繼續欺騙那些士兵，「神

⁴¹ 時人認為聖心標誌是對付革命的精神遏阻辦法。見：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29。

⁴²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60-161。

⁴³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London: Printing-Office of Baylis, 1796), p. 56.

⁴⁴ “defenders of the Altar and Throne,”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56.

⁴⁵ “The Vendéans intoxicated with all the poisons of fanaticism, quitted their churches only to rush upon the enemy, faced with audacity the greatest dangers, sure to conquer

父先用細繩把另一個神父的脖子勒紅了，再給農民看，告訴他們：『這就是從斷頭台上復活的』。」⁴⁶透過欺騙的方式，屈侯將軍記述：「(旺代人的)妻子與母親習慣把她們丈夫與孩子的屍體保存起來。」因為「旺代人長久相信，他們會在死後三天復活。」⁴⁷所以殉教死後，還會如同耶穌一樣，再回到人世間⁴⁸。

在戰鬥進行中，他們不忘信仰能夠給予自己的力量，或者信仰帶給他們的愚勇。即使是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如果他們發現了戰場上有一個十字架或小教堂，全都會跪下，在槍林彈雨下祈禱，數完念珠後，尚存者才起而衝向敵軍。」⁴⁹戰鬥結束後，如果旺代白軍獲得勝利，指揮官便會表現出感謝上帝的樣子⁵⁰，不論這是真心還是虛應故事，但是對士兵們來說，這肯定是上帝聽到他們的祈禱，幫助他們獲得勝利的。他們也會有信心，繼續擔任聖壇與王權的守護者，去面對下一場戰役。也因此巴黎的《鄉民報》(*La Feuille villageoise*)會認為英國人幫助旺代恢復對國王的愛國主義，而神職人員則恢復了旺代人的

or to receive in death the palm of martyrdom.”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58.

⁴⁶ “les pretres leur montraient d'autres pretres dont ils avaient rougi le cou avec une ficelle serree, et leur disaient: Ce sont des guillotines ressuscites.”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

⁴⁷ “The Vendéans believed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y would revive three days after their death. Wives and mothers used to preserve the bodies of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husbands.”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57.

⁴⁸ 耶穌死後復活在《聖經》中有多處記載，如《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及馬可福音十六章等，見：《聖經》和合本，神版，(香港：香港聖經公會，1990)，「新約」，頁44、73-74。

⁴⁹ “S'ils rencontraient sur le champ de combat une croix ou une chapelle, tous tombaient, a genoux et disaient leur prière sous la mitraille; le rosaire fini, ceux qui restaient se relevaient et se ruaient sur l'ennemi.”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

⁵⁰ An emigrant of distinction, *Memoirs of Charette* (London: J. S. Jordan, 1797), p. 33.

宗教狂熱⁵¹。

除了堅信上帝之外，信仰上的另一個影響力，便是由宗教所製造出來的恐懼。人們因為信奉上帝，而害怕撒旦與地獄。雨果在《(17)93年》中，便生動地描述，如何利用恐懼的力量，使人們加入對抗革命的陣營。「有人在一個擁護法律派神父的聖體櫃中放入一隻黑貓⁵²，在做彌撒時，黑貓突然從櫃中跳出。農民大叫：『這是魔鬼！』於是整個教區就起來反抗了。」⁵³雖然雨果在小說中的描述略顯誇張，不過人們在當時本來就對革命與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抱持懷疑，害怕參加這些被教宗所譴責的禮拜與講道，會是一種褻瀆上帝的行為，也擔心他們沒有辦法獲得上帝的認同來得到靈魂的救贖⁵⁴。透過這種情感的發酵，利用根植在羅馬公教信仰上的無知與恐懼，讓這些農民將魔鬼與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及革命劃上等號，壯大反抗的聲勢與力量。

這種對信仰的絕對忠誠，帶給他們無比的士氣，讓他們相信在這場戰爭是正義對抗邪惡的戰爭，要幫上帝把聖壇與王權從魔鬼手中奪回來。上帝會保護他們並應許勝利，即便不幸身亡，也是殉教而死，上帝會對待他們如耶穌一般，讓他們復活。

(二)神職人員與教堂的角色

這裡的神職人員指的是拒宣誓派的神職人員。1790年頒佈的《教士的公民組織法》，把教會從隸屬羅馬公教教廷改為隸屬國家，招致教宗在內的神職

⁵¹ *La Feuille Villageoise*, N°25, 21 Mars 1793, in J. Gilchrist and W. J. Murray, *The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75.

⁵² 黑貓因為被認為是女巫的寵物，所以成為撒旦化身的象徵物之一。

⁵³ “On plaçait dans le tabernacle d'un curé assermenté, d'un «prêtre jureur», comme ils disaient, un gros chat noir qui sautait brusquement dehors pendant la messe—«C'est le diable!» criaient les paysans, et tout un canton s'insurgeait.”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

⁵⁴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69、171。

人員大量反彈。而在旺代地區，依據新法案宣誓的神職人員比例並不高⁵⁵，那些拒絕宣誓的神職人員在共和政府的掌控下，不得公開進行宗教活動。但是，在旺代的居民，反而對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抱持懷疑的態度，上教堂從公開的活動變成了秘密的活動。神父之所以能夠在教堂的講道上鼓舞群眾走上反抗的道路，就是因為在 18 世紀，大多數人都不識字，只能從講道中得到消息。這些講道的神父，是私底下秘密進行儀式的神父，而不是在市鎮教堂上公開講道的擁護法律派神父。聖心的故事與象徵意義，能成為旺代反抗的標誌，其中之一就是那些神父不斷地宣傳。這些數量有多少？雖然沒有詳實的統計數字，但已足夠在旺代戰爭中佔有一席之地。

教堂在舊制度底下作為一個市鎮的核心，除了神父是上帝與人之間的傳聲筒，並透過各種儀式拯救世俗的靈魂之外，也負有一些應該屬於行政體系的功用。在舊制度底下，能夠精確掌握人口的只有教堂，出生、死亡或婚姻等登記，都必須到教堂辦理；教育也是教堂的任務，不過並不普及⁵⁶。而因為教堂往往在市鎮的中心位置，所以居民還能夠透過教堂的鐘聲，得知集會的舉行或者出現緊急狀況等。因此，教堂掌控了當地的人口狀況、知識以及傳播工具。其中，這個傳播工具的核心人物便是本堂神父，不論是在宗教工作上或世俗工作上，他都有相當的力量⁵⁷。在旺代，本堂神父宣誓者不多的情況下，剝奪這個傳播工具變成了共和政府統治的方法之一。從 1791 年開始，共和政府就開始裁撤旺代教堂的鐘，沒有了鐘，神父就沒有辦法用鐘聲來傳達消息⁵⁸。不過這些不宣誓的神父，聯合市鎮居民將部分的鐘藏了起來，等到反抗開始，他們便把這些鐘拿出來，並分給其他已經喪失鐘的市鎮，做為教堂恢復原來功能之用⁵⁹。

⁵⁵ 拒絕宣誓的比例，在旺代的六大區塊中，有五區都超過 50%。見：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40.

⁵⁶ 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書局，2001），頁 207-208。

⁵⁷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36.

⁵⁸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trans. by Martin Th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8.

⁵⁹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p. 48.

當神父站在講壇上，就像是上帝透過他在說話一般，當神父要求大家不要聽從市鎮官員的指令，因為他們是要摧毀大家的宗教時，所有的聽眾都大喊：「保護宗教和好神父。」⁶⁰這種一呼百應的神奇模式，旺代的居民早就習慣了，從洛奇加克林妻子(Marie-Louis-Victoire La Rochejaquelein, 1772-1857)的回憶中，就可以看到神父講道的功用為何。「在革命以前，每當到了狩獵野狼、野豬或雄鹿的時候，神父便由教堂的講道壇上通知農夫。農夫各自拿上來福槍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集合。……後來，他們也以同樣方式和同樣的溫馴服從領導上戰場。」⁶¹因為他們如此相信神父，所以旺代白軍才有能力組成軍隊去作戰。屈侯將軍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應該將旺代人驚人的進展，歸因於他們對將軍與教士的服從及完全的信任。」白軍的士兵也相信「神父們有預言(勝利)的能力。」⁶²他們根本不相信地方政府官員在戰爭爆發前的政令宣導，這些政令宣導「完全無法反擊在旺代人心裡，他們神父講道時所說指示的效用。」⁶³從一個藍軍將領的回憶錄中，看到對自己政府與本堂神父在宣傳效果上的對比，可以相信當時拒宣誓派神職人員回到旺代各教區重新領導人民後，的確是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所以當反抗徵兵的消息爆發出來時，另一位支持共和的作家雨果，他誇張地描述，「當號召三十萬人起而反抗的號令傳達出去時，六百個村莊敲響了教堂的警鐘。」⁶⁴人們開始迎回那些曾經因為拒絕宣誓而被迫離開

⁶⁰ “defending religion and good priests,”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45.

⁶¹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66。

⁶² “We ought to attribute in part the astonishing progress of the Vendéans to their submission and their entire confidence in their generals and their priests.” “These priests had of course the gift of prophecy.”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56.

⁶³ “could not counteract the minds of the Vendéans the effect of the sermons and pastoral instructions of their priests.” Louis-Marie Turreau, *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la Vendée*, p. 57.

⁶⁴ “Le decret de la levée de trois cent mille hommes avait fait sonner le tocsin dans six cents villages.” Victor Hugo,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Quatre-vingt-Treize*,

或轉入地下工作的神職人員，回到原來的市鎮中舉行宗教儀式⁶⁵。

對於神父的作用，站在反方的屈侯將軍覺得是在塑造一種迷信，來讓旺代人自以為獲得神啓。不過旺代白軍的博偉將軍(Bertrand Poirier de Beauvais, 生卒年不詳)，則在《旺代戰爭概述》(*Apperçu sur la guerre de la Vendée*)一書中予以駁斥，他把旺代人在初期會戰勝的原因，歸功於神父宣導大家實踐羅馬公教的教義與精神(*les principes & la morale de la Religion*)。「是因為宗教狂熱嗎？啊！如果所有的法國人過去都保有同樣的感受力(神啓)，那整個法國就不用像今天一般哀傷了。」⁶⁶即使很明顯這段話根本就是為了宣傳而說的。是因為迷信還是因為教義與精神，雙方從不同的角度本就會有不同的解答，不過唯一雙方都承認的是，神職人員在其中佔有一定的地位。如果不是舊制度下神職人員角色的延續，會不會有這麼多人加入旺代白軍，可能還有疑義。

當然共和政府也知道這些神職人員的能力，他們掌握旺代各教區的人口資料，知道可以動員的人力，也是居民的信仰依靠，而這些居民又容易被煽動。因此，早在叛亂剛開始爆發時，1793年3月18日就下了命令，要求所有公民都有責任協助逮捕已經被驅逐的神職人員，一經逮捕，逕送軍事法庭於二十四小時內處死⁶⁷。在這個法令之下，有大批的神職人員被處死。在10月20日，藍軍已經開始反擊並有初步成果之後，又頒佈一道命令，繼續要緝拿那些幫助白軍的神職人員。還特別強調，要注意他們可能持有偽造或白軍將領所發的通行證，一經逮獲，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處死。但是如果是高級神職人員，願意歸順共和政府的，可以赦免。並多加一條，窩藏這些神職人員，與其同罪⁶⁸。

Troisième partie, Livre Premier, V.

⁶⁵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171。

⁶⁶ “Est-ce là du fanatisme? Hélas! Si tous les Français eussent conservé les mêmes sentimens, la France entière ne serait pas aujourd’hui dans le deuil.” Général Beauvais, *Apperçu sur la guerre de la Vendée* (Londres: L’Imprimerie de Baylis, 1798), p. 18.

⁶⁷ ADV L22.

⁶⁸ ADV L662.

據統計，單就 11 月 16 日一天，在南特即有八十四名神職人員被殺⁶⁹。而統計整個旺代地區的神父人數，在 1789 年有七百六十人，其中有二百四十七人不願宣誓，也沒被驅逐，而是躲藏改為地下工作。到了叛亂結束後，共有一百二十三人死亡，比例高達近 50%⁷⁰。在文獻中，也偶有看到教堂被摧毀的紀錄。

神職人員和教堂，本就扮演信仰中心的角色。塞奇·莫斯科維奇(Serge Moscovici, b. 1928,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宗教感情已經滲入到社會大眾中，成了民眾生活的本體和空洞信仰的能量」，當這個信仰要求個人行為時，個人也就受到集體的制約⁷¹。雖然他指的是世俗宗教，但是套用在旺代的羅馬公教身上，也不無道理。他也認為，人在大革命發生之後，被從教堂和土地中驅趕出來，進入一個不穩定的社會，那是因為舊制度的崩解，並沒有一個穩定的新制度立即取而代之⁷²。所以當羅馬公教信仰重新展現在人們面前時，這種集體安定的心理便轉化成一股力量。當然這股力量對藍軍(或者說面對這股力量的人)來說是一種狂熱的宗教信仰，這個狂熱的宗教信仰，從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 1841-1931, 社會心理學家)的論點來看，使旺代人有著整體的群體信念，帶著盲目服從、殘忍的偏執、狂熱的宣傳，就是這種宗教感情，它讓旺代人在集體崇拜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⁷³。正是這樣一個集體制約的力量，讓旺代人受到神職人員的控制，利用教堂這個信仰中心，利用他們對羅馬公教、對上帝的宗教感情，利用他們對死後世界的畏懼與期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意圖奪回王權與教權。

⁶⁹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The Vendée*, trans. by George Holoch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 182.

⁷⁰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184.

⁷¹ “They permeate mass society, becoming the substance of human life and the energy of an empty belief.” Serge Moscovici, *The Age of the Crow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54-357.

⁷² Serge Moscovici, *The Age of the Crowd*, pp. 26-27.

⁷³ 古斯塔夫·勒邦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 54-56。

(三)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的處境

相對於支持白軍的神職人員，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也有他的功能存在。

在拒絕宣誓的神職人員被迫離開之後，因為參加宣誓的神職人員人數不足，有些地方的教堂便沒有維持原本的作用，而是在等待新的本堂神父抵達。然而，這些新的本堂神父，在一開始便面臨許多挑戰。除了當地居民對擁護法律派的神父抱持懷疑之外，有時還必須呼叫軍隊前來保護，地方行政首長也不一定願意配合從外地空降進來的本堂神父⁷⁴。更重要的是，教堂如果不能發揮原本的作用，那它就只是一棟普通的建築物，既不能拯救靈魂，也不能號召群眾，更不能鼓舞人心。雖然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認為革命帶給了舊制度底下的基督宗教啓蒙，但是對於教區的人民來說，他們寧可參加拒宣誓派教士舉行的秘密講道。根據教區記錄，夏培爾-巴斯梅爾教區(La Chapelle-Bassemère)在新任本堂神父到任的九個月內，只有一件婚姻登記案，比起以往冷清許多⁷⁵。這表示人民不能接受這些本堂神父，以及他們背後所代表的共和政府，而且也認為他們不能代表上帝。

旺代人不支持這些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的原因，也跟地方意識有關。首先，這些被派往旺代的神職人員，並不是旺代人，或是在旺代受訓練以便接任神父的人。這些外地人對旺代並不熟悉，也不寬容。他們被旺代人稱為「闖入者」(truton)，意思就是他們不屬於旺代、不屬於教區內的每一座教堂，他們既要擔任神職人員，又要做為共和政府的代表，不僅引起諸多事端，也被認為褻瀆了當地的教堂⁷⁶。在各個教區，這些共和政府所指派的「闖入者」，往往都是問題的來源。在一個名叫拉泰的聖隆巴(Saint Lambert-du-Lattay)教區，便發生軍隊前往新生兒家中，硬是把新生兒帶到教堂受洗，即便他已經在秘密工作的拒宣誓派神父處受洗過，新生兒的母親也被逮捕折磨。而類似的案例常常

⁷⁴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3.

⁷⁵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3.

⁷⁶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3.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69。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43.

在各處發生⁷⁷。不能與當地人融洽相處，又如何能成爲民眾的信仰中心。所以當擁護法律派的修道院院長瓦泰爾(l'Abbé Vattel)準備要舉行彌撒時，他發現教堂擠滿了人群，但是當他走上聖壇時，人群卻一哄而散。他詳實的記載了自己的處境，「我們每天都在被侮辱，即使在教堂中也是。新的市政當局帶回了之前的神父，他們在聖母教堂舉行了彌撒。」⁷⁸人們還是只信任原先的本堂神父，他們不願意他離開，而由一個不認識的人來取代，相信他才有能力拯救靈魂。在康賽爾的聖朱利安教區(Saint-Julien-de-Concelles)的紀錄更是令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難堪，週日早上七點時，拒宣誓派的神父講道，整個教區的人都到了。十點鐘，擁護法律派神父的講道時間，教堂的鐘聲已經告訴全教區時間到了，但是教堂裡仍然是毫無人影⁷⁹。在這種情況下，共和政府要透過教堂控制群眾，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相對的，群眾仍然受到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引導。

再者，繼承了教堂的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理所當然地繼承了那一個教區的傳播工具，而這個傳播工具要告訴旺代人的，跟以往的講道內容有點不同，從地方與屬靈信仰，轉變成爲全國性的、世俗信仰(思想灌輸)的層面，他們的目的是要將革命的意識型態傳播到全國各地⁸⁰。從檔案中可以看到，國民公會發佈命令給地方神職人員，要求他們透過講道來維護自由與平等的理念，並且持續追捕拒宣誓派神職人員⁸¹。雖然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在政府與軍隊的協助下，取得了教區、教堂以及教堂的鐘，並且有了國家給予薪水的保障，但是拒宣誓派神職人員，卻仍保有講道的能力與機會，利用其他的時間，對教區居民

⁷⁷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4.

⁷⁸ “We are insulted every day even in the church. The new municipality has brought back the old priests, who have celebrated mass in the chapel of the Virgin.”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5.

⁷⁹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55.

⁸⁰ Michael Rapport,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 104.

⁸¹ ADV L23.

講道並舉行彌撒⁸²。相對的，沒有人或者很少人會接受的講道，能夠發揮的影響力之低，自是完全不能與那些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影響力相比擬，教區居民還是以原先的神父為依歸。

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無法發揮原先神職人員的作用，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代表的是政府，而不是上帝。在《教士的公民組織法》頒佈後，除了將教會國家化以外，也把教會思想國家化，使得教會成了一種工具，為國家服務的工具。教堂、主教座堂、主教團等，除了當政府傳聲筒和背誦祈禱文之外，所有其他的功能都被禁止了⁸³。這與什一稅被取消後，由政府供應神職人員薪津有關，但也使教會成了由政府供給養分的寄生蟲⁸⁴。一個只能背祈禱文和宣導政令的講道，告訴居民要支持平等、自由的思想與共和政府，與一個還能讓居民期待屬靈生活，得到死後救贖的講道，在宗教的心靈安慰層面上，明顯地由拒宣誓派神職人員勝出。雖然共和政府想要掌控這一個傳播工具，但是一旦將教會組織完全工具化，把教會慈善的功能去除，另外賦予它更多世俗的行政職能，就使這個宗教失去了與人之間的屬靈聯繫，那這個工具便無法發揮它的作用了⁸⁵。

旺代人在兩派神職人員的選擇上，最在意的是宗教生活上的儀式。從小孩出生的受浸、結婚、死後祝聖，到死後世界的救贖與天堂的應許，他們認為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沒有能力給予他們這些聖事，舊的神職人員才有，他們寧願放任小孩子死去，而不願意交給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受浸⁸⁶。因此在追求宗教生活上，只會宣導政令和背誦祈禱文的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不是他們跟隨的對象。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情況。被納編進入行政體系的教會系統，因為仍然握

⁸²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71.

⁸³ Jean Foyer, “La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La Roche-sur-Yon: Centre vendéen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2000), pp. 51-52.

⁸⁴ Jean Foyer, “La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 p. 52.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36.

⁸⁵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34.

⁸⁶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p. 24, 52.

有傳統的教區，並且擔任教區與市鎮之間溝通的角色，這對於共和政府來說，仍然是一個具有威脅性的角色。因此，共和政府不但拖延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派任的時間，透過薪津的發放控制神職人員的舉動，削減教區的力量與功能，將大多數的職務歸給市鎮政府處理，也加強教會系統在行政體系的角色，將之世俗化⁸⁷。如此一來，這個傳統的市鎮中心與信仰中心，便喪失了它的角色。

得不到教區居民的信任，這些神職人員的處境不如以往。對教區居民而言，他們沒有祝聖的能力，對行政機關而言，他們沒有過去教會的影響力。因此，部分的神職人員最後選擇放棄宗教生活，有些人轉入行政體系擔任官員，有些人還俗娶妻生子過平凡生活，更有些人，放棄對共和的宣誓，回到拒宣誓派的陣營，繼續他們對羅馬公教的忠誠以及對教區居民的神聖任務。至於那些還留在共和政府行政體系下的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到戰爭爆發時，多遭以殺害的命運⁸⁸。

羅馬公教在旺代的影響力不言可喻。不論是從政府公文中重複出現緝拿拒宣誓派神職人員，藍軍將領回憶錄中對於神父講道對旺代人發揮的迷信作用，白軍回憶錄中旺代居民對於上帝與羅馬公教的信任與領受，或者旺代居民本身浸淫於羅馬公教數百年來的信仰，可以確認羅馬公教的影響力，對於旺代戰爭中白軍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透過宗教信仰，在戰前號召群眾，在戰時鼓舞士氣，讓在武器裝備上處於弱勢的白軍，能夠在戰鬥士氣上優於藍軍。雖則共和政府意圖如法炮製並全盤接收羅馬公教的影響力，但是一則不信任那些神職人員，一則不斷刪減教堂在市鎮中的地位與作用，又將教會系統定位在行政體系之內，恣意調動派遣外地神職人員。一個被廢武功的教堂與一個不受信任的本堂神父，如何能重新擔任市鎮的信仰中心角色，發揮鐘聲傳播信息的效果。在得不到宗教影響力支援的情況下，既然掌控不了群體靈魂的運作⁸⁹，那摧毀

⁸⁷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36.

⁸⁸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 244.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70。

⁸⁹ 古斯塔夫·勒邦，《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頁 59。

這個信仰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三、羅馬公教勢力的減弱

羅馬公教因為參與旺代的反革命行動，被共和政府視為眼中釘，從 1793 年 9 月反擊白軍的擴張行動開始，便將羅馬公教當作必須摧毀的目標之一。除了神職人員被處決、教堂被摧毀、教產被拍賣之外，最嚴重的便是日後的「去基督宗教」(la déchristianisation)政策，此一政策壓迫羅馬公教直至 1801 年拿破崙與教宗和解為止。

(一) 白軍戰敗與恐怖統治

隨著旺代白軍的戰敗，站在反抗共和政府這一邊的羅馬公教教會，自然也成為共和政府打擊的目標。

羅馬公教信仰的主體，在於神職人員與教堂，神職人員扮演人與上帝之間溝通的角色，教堂則是扮演市鎮中心、傳播工具以及講道場所的角色。教堂雖然曾經被接收，但是在戰爭爆發後又回到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手上，而且教堂建築本身並不會鼓舞群眾去反抗政府，神職人員才是首要目標。因此，在 1793 年 10 月 20 日，國民公會發佈命令，對於在敵佔區和前線持有武器的神父，將會被逮捕並處決，如果是已經被逮捕的，則一併處決⁹⁰。當時南特已經被藍軍奪回，在這個命令下達之後，便有八十四名神職人員遭受處決的命運⁹¹，而在之前南特仍處於兩軍戰鬥期間，整個下羅亞爾省(Loire-Inférieure，南特為其首府)才損失四十一名神職人員⁹²，可以見得國民公會對於那些神職人員在群眾中地位及能力的畏懼，必除之而後快。

也由於白軍在戰場上不斷戰敗的原因，神職人員，特別是隨軍神父的損失

⁹⁰ ADV L662.

⁹¹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182.

⁹² Reynald Secher, *A French Genocide*, p. 184.

數量也不小。在昂熱作戰的白軍，被藍軍擊敗撤退時，便有相當數量的隨軍神父在戰鬥中喪命。不過，大多數神職人員都是在戰敗後，藍軍進駐市鎮時，被捕獲而處決的，能被判處驅逐出境，反而是一種幸運。據統計，在旺代戰爭爆發前，旺代原有超過八百名各級神職人員，而在 1801 年恢復教會體系時，僅剩下一百九十四名，損失便超過四分之三⁹³。周邊省分雖然死亡的神職人員不若旺代之多，但多遭驅逐出境，一如被處決一般，也是沒有辦法再維繫教區的宗教生活。除了神職人員被捕外，也有教堂在戰爭中被摧毀，因為共和政府認定教堂的鐘聲是號召群眾起來反叛的方式之一⁹⁴，但此類為數並不多(教堂與鐘日後被賣出者較多)⁹⁵。即使是象徵信仰的神職人員與教堂從市鎮生活中被移除，羅馬公教實質上影響力已經大幅減弱，但是存在人民心中的信仰，使得共和政府仍然擔心羅馬公教的力量。旺代等反抗地區的居民，還是以羅馬公教信仰為依歸，甚至以羅馬公教的象徵物作為識別的標誌⁹⁶。這也使藍軍在統治時，害怕旺代人的反抗會再起。因而有在恐怖統治時，特別加強對宗教信仰的管控。這時候便不是是否有宣誓成為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的問題，而是所有的羅馬公教信仰活動都遭到禁止⁹⁷。

對於教堂的處理，去除神聖性乃是一種手段。在恐怖統治期間，除了將象

⁹³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9), p. 28.

⁹⁴ Michel Vovelle, *La Révolution contre l'église*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1988), p. 253.

⁹⁵ 約有五十多座教堂被摧毀，雖然無法得知旺代教堂確切之數目，但以市鎮數目估算，仍佔少數。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p. 28.

⁹⁶ 他們用聖心標誌作為識別的依據，因此擁有聖心標誌也成為反革命的象徵，會被逮捕並處決。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75-176。

⁹⁷ 當時抗議教派的宗教活動也在禁止之列，雖然法國大革命發生時，大多數的抗議教派教區是支持革命的。但是在旺代戰爭爆發時，在旺代的抗議教派卻出現因為地方意識而有部分支持旺代白軍的現象，這導致日後恐怖統治時，抗議教派也成為被壓迫的對象，教眾人數甚至比十七世紀還要少。相關討論見：André Benoist, “Les protestants dans la guerre de Vendée et la problématique du conflit,” dans Alain Gérard dirige, *Christianisme et Vendée*, pp. 211-257.

徵意味較重的鐘與十字架拆除，換上三色旗並由軍隊駐守外⁹⁸，把教堂與神職人員的財產拍賣，充作軍費，也是一舉兩得的方法。不但讓教堂成爲一般性建築物，也使羅馬公教信仰失去立足點。根據 1793 年 9 月的法案，當收復白軍佔領區之後，可以進行對叛亂者財產的充公與拍賣⁹⁹。依據此法案，旺代省政府便在 1794 年叛亂大致弭平後，開始拍賣拒宣誓派神職人員及其所屬教堂的財產，檔案詳細記載神職人員的姓名、財產所在地、這些不動產的狀態與價值以及購買後應繳交的稅金等，公告在省政府給有意購買者參考¹⁰⁰，也有關於教堂鐘的估價與拍賣紀錄¹⁰¹，或者將鐘改鑄成火砲等¹⁰²。但也有些教堂被保留下來，繼續用作崇拜的殿堂，只是崇拜的對象不是上帝，而是作爲「理性的聖堂、自由的神殿」¹⁰³，讓革命的理念取代原先的上帝，在教堂中接受人民的崇拜。這些資料顯示，在旺代被藍軍奪回後，作爲支持白軍力量的羅馬公教，其代表性幾乎被徹底清除，神職人員當然早已逃離或躲藏，死亡與被流放出國者也不在少數，而其所留下的教產，尤以最值錢也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的教堂與鐘，不是被拍賣就是被充公，或當作新的宗教殿堂之用。這使旺代人在市鎮當中，失去了一個可以依靠的傳統信仰中心，聽不到教堂的鐘聲來集結圖謀成事，沒有鐘聲告訴他們時刻，也喪失了匯集村落、市鎮集體意識的工具¹⁰⁴。

在宗教儀式方面，除了彌撒、講道等日常的禮拜行爲被徹底禁止，受浸、祝聖以至於結婚登記都停止進行，相關的經書也不准傳播之外，藍軍的恐怖統治，也包含對宗教儀式的不尊敬與嘲弄。藉由對羅馬公教儀式的褻瀆，來削減

⁹⁸ Serge Bianchi,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 233 (Julliet-Septembre 1978), p. 352.

⁹⁹ ADV L380.

¹⁰⁰ ADV 1Q 527.

¹⁰¹ ADV 1Q 681.

¹⁰²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pp. 13-14.

¹⁰³ "temple de la Raison, en sanctuaire de la Liberté."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40.

¹⁰⁴ 這集體意識通常都是由教堂的鐘來維繫的。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pp. 73-74.

羅馬公教的神聖性。其中，最可怕的便是對參與旺代戰爭的士兵與神職人員進行處決的方式。軍事法庭依照法令處決士兵與神職人員，除了使用斷頭台之外，最常見的方法便是「愛國式受浸」(le baptême patriotique)¹⁰⁵。信奉羅馬公教的信徒在出生時都必須接受神父的受浸，象徵與耶穌一樣，可以一起在最終審判時復活¹⁰⁶。這些被判處死刑的人犯，便被以與受浸相同的模式，由軍隊押解到河裡，下水接受「愛國式受浸」。當然這些神職人員與士兵，在下水後就沒有如同耶穌一般「從水裡上來」¹⁰⁷。以這種方式嘲弄這些人的信仰，給予羞辱，無疑是最殘酷的處決方式。總計約有四千人在「愛國式受浸」中被處決¹⁰⁸。

在恐怖統治之下，對羅馬公教而言，情況最嚴重的當屬人(信眾)的問題。羅馬公教教會原先透過教區體系來掌握信仰的狀況以及信徒的人數，在戰敗後，旺代人口數本已急速下降，藍軍在戰後爲了綏靖與治理方便起見，對旺代反抗較嚴重的地區，進行焦土政策，摧毀一切可以作爲反抗依據的村落，並對人口實施大規模的遷移行動，使得羅馬公教教會難以再掌握旺代的情形。在舊的聚落已經被遺棄，而新的聚落卻沒有辦法成立教區、建造教堂、派遣神父的情況下，即使人民依舊心向羅馬公教信仰不變，但教會還能掌握多少人民的行動力，便劃上了一個問號。即便舊的聚落與教堂都還存在，隨著神職人員無法履行職務，教堂也被充作他用，沒有鐘聲召集群眾，羅馬公教的信息也無法傳遞在居民之中。偶有勇於傳播者，被逮捕後都是面臨處決的命運，難以造成很大的影響。新的統治機構在戰後旺代的重建中是擺在第一的位置，相對於教堂被摧毀與拍賣，行政體系的再次確立，目的便是將旺代情勢的掌握由教會體系轉移到政府手中，也讓政府有辦法傳播自己的訊息。

不論是有形還是無形的摧殘，在白軍戰敗後的旺代，羅馬公教因爲支持白

¹⁰⁵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26.

¹⁰⁶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樣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歌羅西書》二章十二節，《聖經》和合本，神版，「新約」，頁 284-285。

¹⁰⁷ 《聖經》中寫明耶穌受浸是全身浸入水中，「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馬太福音》三章十六節，《聖經》和合本，神版，「新約」，頁 3。

¹⁰⁸ Jean-Clément Martin, *Blancs et bleus de la Vendée déchirée*, p. 102.

軍的反抗行動，並且是號召群眾最有力的力量，成為藍軍欲去之而後快的首要對象。在教會組織上，面臨失去神職人員、教堂、教區、信徒的多重打擊，其影響力已遭削弱。隨之而來的，是在旺代綏靖後，欲從根本上去除羅馬公教，讓人民外在與內心都徹底改變的「去基督宗教」政策。

(二) 國民公會的「去基督宗教」政策

雖然 1790 年的《教士的公民組織法》已經把羅馬公教歸於政府的管轄之下，讓反對教會干預政治的理念在法國得以確立。但是從旺代的叛亂看來，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反倒是那些拒絕宣誓的神職人員，在教宗的鼓動以及貴族的支持下，持續號召群眾反對共和政府的統治。為求一勞永逸，徹底抹去舊制度的痕跡，便有更激烈的「去基督宗教」政策出現。

除了減少神職人員的薪俸，以及禁止神職人員教書外，在 1793 年 10 月 2 日，即國民公會宣布要將著名哲學家迪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遺體送進萬神殿的同一天，共和政府開始在地方進行更有系統的「去基督宗教」行動。10 月 5 日，羅馬公教所使用的格列高利曆(le calendrier grégorien)被新的共和曆(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所取代，共和政府要從生活上把羅馬公教的影響連根拔起，不要再讓人民心中保有基督宗教的傳統，不僅刪去了羅馬公教聖人的節日，也去除了星期一至星期日的規律，讓人們再也沒有星期日要去教堂的約束¹⁰⁹。

選在宣布把迪卡兒遺體送進萬神廟的日子，其目的是要宣示摒棄迷信的宗教信仰，改為徹底追隨理性(la raison)¹¹⁰，並且以《人權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為其教條，以三色旗、自由之樹(les arbres de la liberté)為其象徵，美其名為宗教自由，實則為政治手段¹¹¹，用政治神學取代神

¹⁰⁹ Robert Roswell Palmer, *The Year of the Terro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111.

¹¹⁰ Michel Vovelle, *La Révolution contre l'église*, p. 26.

¹¹¹ Robert Roswell Palmer, *The Year of the Terror*, p. 120.

學政治¹¹²。在 11 月 20 日，更於原先的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舉行理性節(*la fête de la Raison*)的慶典，將原先用於羅馬公教的宗教儀式場合，改為新的世俗宗教(思想)教化所用，取代羅馬公教所塑造的集體力量。利用一個新的崇拜，建立一個新的信仰，來打動群眾。這個信仰因為受到理性的影響，脫離了超自然的範圍，成爲一種群眾動員大會式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¹¹³。試圖將教堂鼓動群眾的模式，複製到這個世俗宗教上，讓這個世俗宗教去影響群眾的集體力量，達到「去基督宗教」，但是創立新信仰的目的，來滿足群眾的信仰需求。這是另一種造神運動，它並不是沒有崇拜的形式，也具有自由、平等、博愛等神聖的信條，同樣保有節日與殉道者，完全是複製自身在羅馬公教生活的經驗，來創造一個新的信仰¹¹⁴。因爲可以由政府規定拋棄羅馬公教的儀式與信仰，不代表就可以讓人民放棄宗教對人心裡的慰藉，政府也不會忽視宗教讓人民自願服從的能力。就如同莫斯科維奇所說：「很明顯地，群眾不可能生活在無神的天空下」¹¹⁵。

在地方上，「去基督宗教」政策則是透過軍隊來完成任務。特別是反抗比較激烈的幾個主要省分都進駐相當數量的軍隊，原先以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取代不願宣誓者的方法在這些地區並不受到歡迎，因此必須採取較爲暴力的手法，來摧毀宗教狂熱與迷信¹¹⁶。其首要目標便是象徵羅馬公教信仰與市鎮中心的教堂，除了將教堂內部破壞並劫掠一空外，最重要的舉動，便是把教堂上作

¹¹²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259-260。

¹¹³ Serge Moscovici, *The Age of the Crowd*, pp. 353-354.

¹¹⁴ 卡爾·貝克(Carl L. Becker)著，何兆武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台北：左岸文化，2002)，頁 117。

¹¹⁵ “It is clear that the masses cannot live beneath an empty heaven.” Serge Moscovici, *The Age of the Crowd*, p. 354.

¹¹⁶ Jacques Bernet, “Les origines de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ans le district de Compiègn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 233 (Julliet-Septembre 1978), p. 406.

為傳播工具的鐘拆卸下來，換成象徵共和政府的三色旗¹¹⁷。這是對宗教的存在感進行徹底破壞的方式，為了去除人民心中對羅馬公教信仰的遵從，以及教堂與鐘聲可以帶給反革命分子的激勵，不僅把神聖的教堂世俗化，也讓居民失去以往依循的鐘聲。過去的政策，只是把鐘的數量減少成每座教堂擁有一座鐘，限制鐘聲響起的時間與目的，降低而非去除羅馬公教在社會上的角色。此時卻演變成將鐘拆卸之後，改鑄成戰爭用的火炮，把羅馬公教精神的象徵，變成共和政府愛國的殺人武器¹¹⁸。這種行為近趨於一種「聖像破壞運動」(l'iconoclasme)¹¹⁹，以共和政府的意識型態取而代之。

作為上帝與人之間溝通角色的神職人員，在「去基督宗教」政策之下，也無法繼續舉行宗教儀式。拒宣誓派者依然持續遭受追捕，包括法國本土與外國籍的神職人員；而有宣誓成為擁護法律派者，也有系統地遭到國家大量辭退(名義上是自動讓出教會系統的職位轉任其他政府機構或擔任教師，也有自願還俗者)¹²⁰，造成多數教區的教會系統難以維持。形成有教堂建築物本體存在，但是裡面沒有宗教器物、沒有十字架、沒有鐘聲，也沒有本堂神父主持的現象，使羅馬公教體系在各地崩解¹²¹。共和政府的這些做法，期待羅馬公教在沒有儀式進行，沒有神職人員帶領，也沒有精神象徵得以崇拜下，信仰會在人民心中自動瓦解，轉而用真理填補心中的空虛。藉此意圖表現革命不僅可以改變世俗政體的統治，也能夠改變精神和靈魂所屬的宗教信仰，他們透過許多退職的神

¹¹⁷ Serge Bianchi,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p. 352.

¹¹⁸ 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pp. 12-14.

¹¹⁹ 一般指 8 世紀時期，發生於拜占庭(Byzantine)移除耶穌聖像之事，泛指去除所有象徵宗教意味的事物，學者在此形容法國當時的「去基督宗教」政策。Serge Bianchi,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p. 352.

¹²⁰ 大約有一萬八千五百至二萬名神職人員被辭退，在沒有精確數字的情況下，Michel Vovelle 認為擁護法律派神職人員當年應有約二萬六千五百名，所以比例大約是 70% 至 75%。Michel Vovelle, *La Révolution contre l'église*, pp. 103-105.

¹²¹ Pierre Pierrard, *L'Églis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Nouvelle Cité, 1988), pp. 89-90.

職人員發表類似的聲明，指出法國人長期受到羅馬公教可笑儀式的愚弄，現在應當擦亮眼睛追隨真理的腳步前進¹²²。在「去基督宗教」政策下，令人特別注意的還有神職人員的動向，名義上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各地是否繼續維持神職人員的角色(這也與地方預算是否願意繼續開支神職人員薪津有關)，實際上則是要各地方貫徹巴黎的意志。當神職人員都宣佈放棄信仰了，底下所屬教區的人民，又還有何理由繼續信奉不倦。就在他們放棄對基督宗教信仰的動作下，象徵在屬靈的層面，共和政府已經控制了宗教這一門統治手法。

在羅馬公教信仰比較堅固，被歸類為應當「強力去基督宗教化」(la forte pression déchristianisatrice)¹²³的地區，共和政府一面以激烈的暴力手段摧毀信仰的象徵，改為共和政府的意識型態，一面也不斷在各地方舉行演說，告誡這些地區的居民，不要再支持反對共和政府、反革命的行為。同時，也在已經收復的市鎮，利用過去的教堂或是新的廣場，舉辦尊崇理性的慶典，取代對上帝的禮拜，意圖改變原有居民的宗教信仰，轉為接受共和政府的價值觀。但是對於共和政府的這些手段，包括旺代在內應當「強力去基督宗教化」的居民並不領情，即使在外在環境已經充斥著共和政府的意識型態下，人的內心還是很難加以改變，這些人依舊選擇傳統上，根植在生活習慣裡的羅馬公教信仰，拒絕接受新的(世俗)宗教價值與精神¹²⁴。共和政府想要減去羅馬公教信仰的影響力，要讓羅馬公教的重要性從市鎮當中移除，也從人民的心中移除，吹起的風暴，不僅在實體上也在精神上重擊羅馬公教¹²⁵。前者算是成功了，在「去基督宗教」政策下，羅馬公教信仰的象徵，在一種「聖像破壞運動」的帶領下，被嚴重破壞，鐘聲不再響起，十字架被拆除，聖心標誌與《聖經》被禁止使用，的確使羅馬公教信仰受到相當的打擊。但是後者，要去除一個根植數百年的宗

¹²² Pierre Pierrard, *Histoire des curés de campagne de 1789 à nos jours*, pp. 68-69.

¹²³ 相對者為「低去基督宗教化」(la basse déchristianisatrice)地區。Philippe Goujard, “Sur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ans l’ouest,”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 233 (Julliet-Septembre 1978), p. 434.

¹²⁴ Philippe Goujard, “Sur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ans l’ouest,” p. 440.

¹²⁵ Pierre Pierrard, *L’Église et la Révolution*, p. 89.

教信仰，只用創造一個新的宗教(共和政府的意識型態、以理性作為世俗宗教)來取代，並且嚴格禁止其他宗教活動，對於人民的影響並不顯著。在旺代戰爭爆發前，他們可以在《教士的公民組織法》通過後，繼續在拒宣誓派神職人員的帶領下崇拜上帝、做彌撒，自然也可以在另一個新的宗教下，繼續保有原本的宗教信仰。不過，這種情形在旺代戰爭結束，「去基督宗教」政策強力推行下，只能把信仰放在心中，而不能有公開的作爲了。

至 1794 年春，巴黎已經將所有教堂關閉，羅馬公教在法國全境也不再有任何公開的儀式(反抗軍佔領區除外)，剩下未被辭退的神職人員，於 1795 年也不再薪俸¹²⁶。「去基督宗教」政策至此已經完成其使命，旺代人沒有了教堂與鐘聲，也沒有神職人員帶領，羅馬公教難以再發揮一呼百應的效果，來對抗共和政府的統治，其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去基督宗教」政策雖然對信仰、儀式極盡嘲弄，並迫害羅馬公教信眾，但是羅馬公教影響力的衰微，主要不是這個政策所造成的。革命只是彰顯出羅馬公教影響力減弱的現象，並加速其進行而已。因為在舊制度時期，社會壓力迫使人成爲集體性的動物，必須要遵守社會規範，參加羅馬公教儀式，即使早已不信奉羅馬公教，多數人在星期日還是會上教堂，實踐宗教行爲，佯裝具有宗教信仰，以免遭受異樣眼光¹²⁷。但不論羅馬公教是否在革命以前即已出現衰退的現象，在旺代，羅馬公教於 1793 年至 1794 年的反抗行動，仍然展現出它的影響力。而「去基督宗教」政策，也確實重擊了旺代的羅馬公教能量，不僅在旺代，也在法國大部分地區，使羅馬公教一時之內沒有辦法恢復它的榮光。

相對的，取代羅馬公教地位，被法國榮耀的是新的革命宗教。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認為國家的法律和宗教的影響力，使人民面對兩個可能不同的意見，這讓人民不知道應該聽從神父講道時宣揚的「上帝的話語」，抑或政府頒佈的訓令，也使得信奉基督宗教的國家不能有良好的政治

¹²⁶ 什一稅在《教士的公民組織法》中即已被廢止，改由國家給予薪俸，這次廢止薪俸，等於強迫神職人員轉行。

¹²⁷ 雷蒙·瓊納斯，《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頁 192-193。

出現。¹²⁸國民公會的領導群，受到啓蒙思想家盧梭的影響，再看到旺代地區的人民寧願聽從羅馬公教教會的旨意，也不願接受國民公會訓令的指導，對羅馬公教更是深惡痛絕。然而盧梭也認為，宗教是有其力量的，但是要被限制在公共利益的範圍之內，讓每個公民都有同樣的宗教，可以使他們樂於盡到自己的義務，只要他們是一個良好的公民就可以了¹²⁹。這也是國民公會的想，創造出一個新的宗教，這個宗教是為國家社會服務的，其世俗的性質，目的是在教育人民成為一個好公民，能夠服從革命思想與政府統治。「最高主宰」(l'Être suprême)由上帝變成了理性，理性成為新宗教的「上帝」，填補上帝離開法蘭西的精神真空，讓人民繼續有信仰的對象，只不過換了一個「神」而已¹³⁰。

這個政治的「神」是否填補了旺代人在羅馬公教力量衰微後的精神真空狀態，雖然沒有資料可以得知有多少人崇信這個新的「神」，不過從 1799 年的再次叛亂仍然以羅馬公教為號召來看，顯然這個新的「神」並沒有得到人民真正的認可。羅馬公教的影響力是衰退了，沒有神父講道，沒有教堂做彌撒，沒有十字架或念珠可以在身邊使自己得到保佑，但是人們的心中還是期待死後世界與永生，這才是宗教的給予人的最大安慰。「去基督宗教」政策，始終沒有辦法打倒在鄉村居民心中根深蒂固的羅馬公教信仰，即使上帝的教堂已經不存在了，世俗的宗教，還是無法在這方面取代屬靈的宗教¹³¹。當王權於 1814 年復辟之後，在國內的傳教活動，便又把羅馬公教信仰還給了旺代居民。

¹²⁸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徐百齊譯，《社約論》(*Du Contrat Social*)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台二版)，頁 169。

¹²⁹ 盧梭，《社約論》，頁 176。

¹³⁰ 劉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教育》，頁 259-260。

¹³¹ Jean-Clément Martin,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 241.